

西方视野中的
白银时代

林精华 主编

上

RUSSIAN
SILVER
AGE

RUSSIAN
SILVER
AGE

西方视野中的 白银时代

林精华 曹雷雨 赵桂莲 姜 丽译

RUSSIAN
SILVER
AGE

上

林精华 主编

RUSSIA
SILVER
AGE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 彬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视野中的白银时代/林精华编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2

ISBN 7-5060-1391-6

I. 西…

II. 林…

III. 文学史-研究-俄罗斯-近代-文集

IV. I512.0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341 号

西方视野中的白银时代

XIFANG SHIYE ZHONG DE BAIYINSHIDAI

林精华 编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2

字数:698 千字 印数:1-3500 册

ISBN 7-5060-1391-6/Z·151 定价:41.00 元

序言：从下个世纪之交看 上个世纪之交、从西方看俄国

伊琳娜·帕佩尔诺(Irina Paperno)

这是一部反映了西方学者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研究成果的译文集。由于林精华博士大胆的创新精神和内行的编辑工作，中国读者将第一次看到西方人是如何看待所谓俄国“白银时代”(Silver Age)文化的。而他们的阅读和判断，将会对我们 20 世纪共有的跨文化经验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近年来，俄国学研究者一直在积极地寻找思考和描述本世纪初形成的种种文化模式的新方法。20 世纪正接近尾声，历史学家在回顾中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历史上独特而又统一的时代，并且对推动文化发展的组织原则予以反省。从这一角度出发，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有些学者认为要扩展到 30 年代）这一时期被看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其间曾发生了一场文化上的革命。在最通常的意义上，这一时期——西方文化总体发展上的一个独特时期——是作为“现代主义时期”(the Age of Modernism)被提及的，而“白银时代”这个习语常常用来标志俄罗斯的 20 世纪初^①。这一习语

① 有些学者把白银时代限定在 19 世纪 90 年代～1917 年，而另一些学者则确定为 19 世纪 90 年代～20 世纪 20 年代；近年来西方推出的成果，如本译文集中的一些文章，已经提议把白银时代的时间划定在 19 世纪 90 年代～20 世纪 30 年代初。

在暗示着“白银时代”是对一百年前另一个时代的继续,现代俄罗斯文化和文学被认为在那个时代(狭义上的后中世纪,即 post-Medieval)就已经形成了,这就是 19 世纪(18 世纪 90 年代~19 世纪 30 年代)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或“普希金时代”(age of Pushkin)①。

本世纪初,俄国文化生活(文学、艺术、智识发展)在力度、灿烂程度和多元方面达到了高峰。审美理论、艺术运动、艺术团体、出

① “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术语(接下来的时代被命名为“铁器时代”或“铜器时代”)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和诗歌(尤其是要追溯到奥维德的《变形记》与荷西俄德的《劳作与时日》)。这些名称的内涵包括:某种模式的反复出现、一代代的延续、逐渐的衰退。俄国 20 世纪最初几十年适用于“白银时代”这个名称,(尤其是自 60 年代以来)该名称在俄国文学批评家、学者和鉴赏家范围内已经很通行。这个概念在俄国文化领域中的运用获得了另外的含义:在 19 世纪中叶出现的文化断裂或崩溃之后,产生了 20 世纪初的文化复兴(cultural renaissance)。研究这个时代的一位著名学者奥姆里·罗南(Omry Ronen)在近期推出的著作《20 世纪俄国文学中白银时代的谬误》(阿姆斯特丹,1997)中,把“白银时代”的概念和以此类推的“黄金时代”概念下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该名称在 30 年代置身于西方国家中的俄国侨民圈子内逐渐变得普通起来,与在苏联国内的阿赫玛托娃之《没有主人公的诗》(或《没有英雄的史诗》)(1940)遥相呼应。在奥姆里·罗南看来,这个概念是“一个严重使用不当的名称”,它误导了对俄国文化和文学发展的评估。奥姆里·罗南提醒我们说,这个名称是对俄国侨民文化大师写作的一个挑战,是对致力于使“白银时代”概念在西方保持生命活力的批评家和出版家格列布·司徒卢威的质疑,是对伟大的文学史家德米特里·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著作的怀疑。在这篇序言和本译文集的许多文章中,“白银时代”的概念通过频繁使用而合法化起来,是作为通常含义来使用的:这个当代批评术语是用来标志俄国自我估价和自我意识的一种范式。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其他人对某种概念还很犹豫而历史学却运用得稀松平常的情形下,要改变这个概念可能太晚了”(唐纳德·特雷德格尔得:《俄国和中国视野中的西方》第一卷《俄国,1472~1917》、第二卷《中国,1582~1949》。奥姆里·罗南的著作《20 世纪俄国文学中白银时代的谬误》引用了这段话)。

版事业纷纷登上文化舞台；从事这些活动者讨论各种不同思想、阅读诗歌、参加各类轰动一时的先锋艺术展和富于革新精神的戏剧演出、发表各种宣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进度出版自己的作品；他们也有激烈的对话和争论，并且试图依据一定的理论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与此同时，他们经历了许多巨大的历史事件并接受了痛苦的艺术和个人危机。当下的学者们谈论这时期文化的时候，还会提到许多自我命名的运动和团体、象征主义（和象征主义者）、阿克梅主义（和阿克梅主义者）、未来主义（和未来主义者）等等。他们也会谈到现代主义的普遍精神。关于这个时代已经写了很多了。

“20世纪”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确立下来了，当时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即形式主义宣称，文学的形式特征是第一个连贯而专业的文学讨论方法^①。在斯大林统治之下的整个30~50年代，“白银时代”遭到实际上的禁止，明显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话题。白银时代文学不再出版，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大多数作家的名字很少公开提及。许多20年代流亡国外的白银时代作家（包括诗人和批评家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和济娜伊达·吉皮乌斯、青年诗人霍达谢维奇、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把俄国白银时代带到了西方。十月革命之后和斯大林时期一些重要人物离开人世（先后包括：勃洛克因为国内战争期间物资匮乏而于1921年死于病魔，古米廖夫1921年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而遭镇压，库兹明1936年享尽天年，曼德尔什塔姆于1938年死于

① 下列著作都具有这种特征：日尔蒙斯基的《当代抒情诗发展的两个方向》（1920），罗曼·雅可布逊的《最新俄国诗歌。维克多·赫列勃列科夫》（1921），艾亨鲍姆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分析的经验》（1923），温格诺夫的《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连贯修辞》（1925）。

劳改营)。30年代之后留在苏联的幸存者中最著名的只有安娜·阿赫玛托娃,她生活在无声无息和隔离的状态(这种状况有时候被称之为“国内侨民”)^①。

经历了几十年的中断之后,对白银时代的了解在苏联自由的60~70年代得以复兴;而后,80年代后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白银时代的复兴获得了一种新的动力。60~70年代,开始限量出版发行白银时代的一些文本,大多数是学术版本,继之而起的研究也是小心翼翼的,即通常关注的中心是苏联意识形态语境中被视为“中立”(neutral)的一些作家和主题,如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歌。勃洛克出于诸种原因(例如1918年创作了“革命”的诗篇《12个》),同时也因为决定的随意性,他的诗歌被官方所接纳^②。此时学术出版也小心谨慎地对(白银时代

① 例如,有一篇愤怒的个人自述,作者叙述了官方试图破坏对白银时代的记忆情景。该文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出现在俄国的,它是由60~70年代积极参与期望复兴白银时代的康斯坦丁·阿扎达夫斯基撰写的,题目是《白银时代是如何消亡的》(《文学报》,1993年第44期第5版)。

② 在60年代和70年代,有些苏联学者试图把白银时代文化重新整合进俄国文学范围内,“勃洛克”就成了一种文字符码,即象征着与其名字相联系的那个时代全部被查禁的文化。另一些不被公共领域所接纳的名字,也可能被引入“勃洛克”的语境中(例如库兹明在苏联出版界充其量仅仅是一个只被提及的诗人,根纳吉·什马克夫却写了一篇论库兹明的先驱性论文《勃洛克和库兹明》,载《勃洛克文集》第2卷)。爱沙尼亚共和国境内的塔尔图大学中由扎纳·明茨所领导的一个小组,在苏联时期的白银时代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塔尔图大学编辑出版了一个系列图书,即《勃洛克文集》(第一版是1966年,到1996年出了第13版)。这些活动与所谓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努力之前,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德米特里·马克西莫夫已经做了重要工作,即早在40年代初就开设了勃洛克讲座,这给下一代大学生研究白银时代文学(包括敏茨在内)作了准备(参见马克西莫夫《勃洛克的诗歌与散文》,1975)。

最著名作家中的)安德列·别雷、伏亚契斯拉夫·伊万诺夫、奥西普·曼德尔什塔姆和还健在的诗人阿赫玛托娃等人作品进行有限的研究^①。另一些人的名字直到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直到那时尼古拉·古米廖夫和米哈伊尔·库兹明的作品才在俄国出现)才重返公共领域。在 60 年代后期斯大林的自由化时期,“恢复”名誉的名单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即依据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如古米廖夫的例子,他是作为反革命分子被镇压的)、审美和“道德”因素(如库兹明的例子,他那晦涩、过于讲究审美的诗歌中,弥漫着性爱的主题)。

在 60~70 年代的苏联,一个有限的读者群体发现了“白银时代”(这里所指的白银时代所限范围是 1917 年革命之前的 30 年),它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圈子中的一种神话。白银时代是一种失落了的文化的形象,是遭受斯大林体制残酷摧残的文化的形象,是渴望的对象,是人們在一个集体性的回溯认同的努力中希望回归的一

① 这些年间出版的白银时代作家作品的重要成就是:《亚历山大·勃洛克 8 卷本文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60~1963);《伏亚契斯拉夫·伊万诺夫抒情诗与长诗集》(列宁格勒,1976)(这本不厚的书前,有著名学者谢尔盖·阿韦林采夫写的引言);《索洛古勃诗集》(列宁格勒,1975)(诗人丛书之一);《安德列·别雷抒情诗和叙事长诗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75)(诗人丛书之一),小说《彼得堡》(莫斯科,1981)(文学纪念碑之一,有多尔戈波洛夫和拉夫罗夫的评注);经多番艰苦努力和以严格审查的形式,出版了《曼德尔什塔姆诗集》(列宁格勒,1973)(诗人丛书之一);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在 60 年代被许可出版了好几次,其中包括诗集《时间急流》(莫斯科-列宁格勒,1965),这是 60 年代文学生活中出现的重大事件之一;年轻一点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 50 年代因为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被官方疏远,因而出版《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和长诗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65)(诗人丛书之一,有安德烈·辛亚夫斯基的评注)也是当时重大事件。特别是,后来苏联出版了未来主义实验诗人《赫列勃尼科夫作品》(莫斯科,作家出版社,1986),该书由格里戈列夫和帕尔尼斯评注。

个领域。它废除了(即使只是精神上的)苏联官方文化所统治的这几十年间发生的一切^①。白银时代的作家们——如阿赫玛托娃和赫曼德尔什塔姆——受到了秘密的崇拜,得到了西方俄国侨民情感上的回应。这种情感上的尊敬既是对学术研究的鼓舞,又对学术探索构成了障碍。

与此同时,俄罗斯文化早已经成为欧美颇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在西方国家,俄国侨民和西方专业学者以俄文^②出版了白银时代的众多作品(尤其是在美国高校,俄国研究是一个地位稳固的相当

① 参见诗人叶琳娜·伊戈娜托娃刊于《涅瓦》杂志1992年第8期的文章《我们是谁?》(最早是1982年刊载于地下刊物《环绕的沟渠》),该文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种情景。她写道:“60年代体现了‘白银时代’和20年代文化的怀乡忧愁特征。让我们想起了我们当初是怎样认识那个时代的:以前默默无闻的那几十个人的名字,后来无可匹敌的辉煌文学、哲学、艺术……所有这些都被一下子中断了,而使之成为远离我们的遥远过去和神话时代。我们作为受难者运用当时的知识,讨论精神专制的残忍利剑……在后来形成的一个并不真正有益于其他时代俄罗斯文化的观点影响下,我们成长着和受着教育。这就是我们过去确信而现在信仰的‘白银时代’,它没有历史的前瞻,也没有分析”(第254~255页)。

② 侨民出版了一大批白银时代的重要作品,而且比同时期苏联出版得更加全面。他们也有障碍:因为编辑校订这些出版物时缺乏手稿和参考资料(在苏联它们保存在档案馆和私人手中,西方的学者是难以接近的),他们经常是一些有残缺的文本,并且有的注释也不全面。其中重要的版本有:格列布·司徒卢威与菲利伯夫主持的《尼古拉·古米廖夫4卷本文集》(华盛顿,1962~1968年俄文版)、《阿赫玛托娃两卷本文集》(Munich, 1965)和《奥西普·曼德尔什塔姆3卷本文》(Munich, 1967年俄文版)。而侨民学者弗拉基米尔·马尔科夫和美国学者马尔马斯塔德(Malmstad)联合编辑出版的《库兹明3卷本诗集》(Munich, 1977年俄文版)、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与马尔马斯塔德联合编辑出版的《霍达谢维奇3卷本诗集》(第1、2卷分别于1983、1990年在密歇根出版俄文版,迄今为止还没有出完)完全是一个例外,这些版本不仅珍贵而且校订得非常出色。

大的领域)。80年代后期,由于再度解放(戈尔巴乔夫时期)，“白银时代”在苏联得到了充分的复兴:学术版本和大众读本首次大量面世^①;讨论和研究极度兴旺(proliferated)。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对俄国文学的阅读和研究再也没有意识形态及政治的限制了。但是,因为历史观点的不同和学术传统的差别,西方研究白银时代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俄罗斯式的方法。方法论上的不同在于:在最一般意义上,俄国学者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文本上——热衷于对文本及其出版和传播的情境进行复杂的文本学重构,喜欢对

① 晚期苏联和俄罗斯出版的学术版本包括:《安德列·别雷诗集》(莫斯科,书籍出版社,1988年)和别雷系列回忆录《世纪之交》、《世纪之初》和《两次革命之间》(莫斯科,1989、1990、1990),《论勃洛克》(莫斯科,1997),它们都是由在70~90年代保存和复苏白银时代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俄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拉甫洛夫主持的;《伏亚契斯拉夫·伊万诺夫两卷本抒情诗、叙事长诗和悲剧集》(圣彼得堡,诗人丛书,1995年);《曼德尔什塔姆两卷本文集》(莫斯科,1990),这是由涅尔列尔主持校订的,而《曼德尔什塔姆4卷本文集》(莫斯科,1993~1997)和《曼德尔什塔姆诗歌全集》(圣彼得堡,诗人丛书,1997)是由梅茨一丝不苟重新校订的,还有米哈伊尔·加斯帕罗夫写的导言。出版不太有名诗人的选集,在弘扬“白银时代”术语方面也是很有贡献的:《俄国白银时代诗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3)。老学者波戈莫洛夫在复苏白银时代方面很有贡献,90年代他还在勤奋工作,经由他所校订的《古米廖夫3卷本文集》(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90)使得古米廖夫也为读者所熟知起来。沉默了几十年后,出色的两卷本《米哈伊尔·库兹明选集》面世了(列宁格勒,文学艺术出版社,1990),它是由拉甫洛夫和季缅契科联合校订的,而《库兹明诗集》(圣彼得堡,1996)则是波戈莫洛夫负责校订的。十月革命之后流亡国外的早期象征主义者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其作品也于1990年得到出版。苏联解体之际,《帕斯捷尔纳克5卷本文集》(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89~1992)第一次公之于众,这是由E.V.帕斯捷尔纳克和波利瓦诺夫主持校订的。一部全新的《勃洛克全集》(计划20卷)正在编辑之中,第一卷已于1997年问世。

文学作品内在结构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①；而西方学者倾向于语境化——从文本到整个文化，去思考构成文化基础的基本（审美和哲学）原则，思考文化在整个西方以及俄国较大历史语境中的地位。研究态度上也有差别：对于俄国学者来说，“白银时代”是一笔被强有力地重新获得的民族遗产，这笔遗产是一笔被延误收到的遗嘱——这纸来自过去的遗嘱已在俄国遭到破坏，其中一部分迁移到了西方^②；对于西方专家来说，白银时代是一座实验室，可用来对处于历史分期时的一种文化进行分析。不过最近几年，研究白银时代的这两种观点——如西方的观点和俄国的观点——出现了一种汇合趋势。

① 有一个典型案例：《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1890~1917》（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3）附有一个对诗集介绍的导言，它是由俄国诗歌专家米哈伊尔·加斯帕诺夫撰写的，题目是《“白银时代”的诗学》，在不否认——如现代主义惯例历史等其他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下，该文确立了诠释俄罗斯现代主义在动词结构及其意义上的“诗学最重要特性”之直接目的，而“这一最重要特性”指的是“现代主义对待语言的态度”（《对现代主义诗学最重要的诠释：现代主义与语言的关系》，第9页）。

② 请参见近年来由俄罗斯科学院出版发行、俄国学者推出的《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品集》（莫斯科，1993）一书前言（前言作者没有署名）：“早就被意识到的俄罗斯文化被迫迁移并取名为‘白银时代’的现象……不久以前还是作为否定性现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准确地说，如果讲到某个大范围的读者群，那么只是近年来这一现象才在我们这儿闻名起来的，但是目前更加重要的事情是：在意义根本不充分和意义时常并不完全等同的情形下，对被正式注册的权力之继承、立某个抽象遗嘱的权力，从奇怪的对抗性延误中来到我们面前，所谓‘白银时代’就是证实这些权力的”（第3页）。因为罗列了编委会成员V.V. 伊万诺夫、V.N. 托波洛夫和T.V. 齐温的名字，这本书引起了以前著名的团体“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注意，该学派连同当下还积极研究白银时代的学者尼古拉·波戈莫洛夫一道，是60~70年代复苏白银时代研究的主力。

怎样从另一个世纪之交看上个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化？西方又是如何看待这时期俄国文化的？

文学和文化史学家，总结了从 19 世纪 90 年代发展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系列不同的潮流，由此论及了现代主义的基本精神。“现代主义”的概念——用于整个西方文化——使人想到一个新的“现代”意识或源自当下的心态，以及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这种心态的力量源自当代人共有的一种独特感受：一种天启的感觉，即生活在历史的“断裂点”上的人类注定要进入崭新的时代和全新的世界，成为“新人”^①。现代主义意识认为，已经被接受的世界观及世界本身，能够并将会被重组和再创造——这个再创造过程与审美创造类似，又不缺乏神秘性，即具有神性创造的特征。

历史学家注意到白银时代是一个融合各种不同学说和信仰的综合性文化。一位学者说，“这时期的特色是，自豪地重新发现俄国的历史并迅速与西方融合”^②。事实上，在这个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化中，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交织、马克思主义的汹涌而入（成为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现在俄国的一种强大现象）与俄罗斯东正教的复兴恰好一致、唯科学主义与神秘主义结合在一起、拒绝传统与依赖历史相伴随。这个时代，精英文化与大众运动携手并肩，而对于创造了我们所谓的“白银时代文化”的精英来说，精致的唯美主义与社会关怀和革命精神共存。

现代主义把自身描绘成（并且经常被学者们描绘成）对前一时期的（19 世纪中叶）实证主义和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反动，是对

① “现代主义”概念作为一种话语，适用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情况，参见马·布雷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论文《现代主义的名称与性质》，载他们合编的《现代主义：1890～1930》（Middlesex, England, 1976），第 19～55 页。

② 唐纳德·特雷德格尔德：《俄国和中国视野中的西方》，第 1 卷，第 241 页。

过去文化的否定。整个欧洲各种现代主义运动背后的主要动力，就是对实证主义认知模式的反抗。这一模式所依赖的是从属于现实主义表征的可获得的经验事实。这种关于经验上所赋予的、客观上存在的（“自然的”）事实之理念在许多种知识领域——哲学（新康德主义）、物理学（玻尔和爱因斯坦）、心理学（弗洛伊德）、艺术（立体主义）——中遭到了质疑。创造性原则占了首要的地位——包括自发性原则，诸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所提出的“创造性进化”以及蓄意性原则。在蓄意性创造观念的构架中，其思想强有力地影响了现代主义的尼采，呼吁人类进行自我创造——一种审美过程；新康德主义学派哲学家重点强调人的意识及其概念化的必要性。对“自然”这个概念（被实证科学所模式化）的怀疑，振奋了现代主义中的一个强大潮流。那些持怀疑论的人们，对生活按照自身“自然”轨迹运行的合法性与价值提出了质疑。这一态度支撑了（sustained）一种感觉，即“现实”（社会规则、历史、个人生活、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形式）本质上是蓄意性创造行为的一个对象。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在建构（或重构）世界的事业中，艺术注定要起重要的（即便不是首要的）作用。

整个欧洲文化中有着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每一种都源于其民族语境的特殊性。让我们来看看俄罗斯文化的一些特征。自中世纪以降，俄罗斯就有了悠久的启示录式思考的传统，它所受的滋养来自对日益迫近的世界末日的热烈期待；这一传统与哲学和社会中的乌托邦思想，即与重建一个更好世界的具体计划紧密交织在一起。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文化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即迷恋实证性的“现实主义”、迷恋现实主义所狂热崇拜的客观真实（物质实在或感官经验）和“行动”（社会行为主义，主要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现实主义运动成熟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伴随着所谓的“大改革”，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乌托邦思想和文学

在现实主义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①。20世纪初,俄罗斯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巨变:日俄战争,一个西方大国(这是俄国人想象中的俄罗斯帝国)在此第一次输给了一个东方强国;1905年革命,至少使一些激进知识分子对群众暴力产生了恐惧并具有了负罪感;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拖进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现代化战争之中;1917年革命,随后新的苏维埃政体得以确立。

俄罗斯现代主义精神在这一语境中逐渐形成,并得到固有的文化范型和当时历史环境的推动。我们可以谈谈世纪之交的俄国特别强烈的启示录式心态和情感。那些有文章被本译文集所收录的学者们特别关注白银时代文化中的启示录式想象,从小说中的启示录形式到救世计划,其中艺术与宗教和政治联手形成了拯救个人的可行性方案并描绘了未来世界的乌托邦蓝图^②。此外,绝大部分学者把有意识进行文化创造的现代主义原则作为他们研究的起点,这一原则的目的在于完成个人和社会领域的救赎与重构,因此这些学者把俄罗斯现代主义视为一种“审美乌托邦”^③。

确立在历史上的位置是现代主义自身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尽管现代主义认为自己是历史的激进反叛,但在许多现代主义者的头脑中,始终存在着可感/可见的(尽管是被否认的)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和20年代的早期苏维埃文化中,19世纪60年代发端的革命传统与世纪末生活的现代主义情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1)是空想社会主义小说《怎么办?新人的梦》的作者,他在乌托邦语境中得到人们的纪念。

② 在本译文集中,参看戴维·贝茜娅(David Bethea)关于现代俄国小说的“启示录模式”之研究,伊雷妮·马辛-得利奇(Irene Masing-Delic)对哲学思想和小说中的“救赎”之探究。

③ 本译文集从《生命创造:俄罗斯现代主义中的审美乌托邦》(斯坦福,1994)文集中选录的几篇文章,论述了这样的观点。

感以及先锋派试验精神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形式独特的乌托邦主义。这些的连续性背后隐含着与过去的一个公开的大决裂,因而受到西方学者特别的重视。追溯文化传统中断裂与延续相互错综复杂的关系成为本译文集中许多学者的首要目标^①。

生活在时代的“终结”、“边缘”和“分化”点上的现代主义作家,满怀启示录式的情绪,他们努力描绘种种平行关系和交叉关系,要把他们的时代写进历史的基本结构中去。“俄国诗歌的白银时代”的自定义、对“黄金时代”和作为现代俄罗斯文学缔造者的普希金的迷恋,可看作这种与历史连接之愿望的一个部分。在现代主义者关于过去和现在的观念中,强烈引导现代主义历史意识的,并不是具有 18、19 世纪理性主义史学特征的发展和连续的观念,而是神话时代的体系。其中,时代循环论思想就以尼采的“轮回之链”(ring of recurrence)思想为中介。尼采著名的时代模式论“永恒的轮回”意味着,在历史和个人生活中的任何当下时刻都再造了过去的一瞬。在《悲剧的诞生》(1871)中,尼采预言古希腊即将复活或回归。在俄罗斯现代主义中,古典时代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仅提供了认同古典原型的基本冲动,而且也提供了仿效的具体模式(例如,本译文集收录的瓦西里·鲁季奇的文章《伏亚契斯拉夫·伊万诺夫与古典时代》详细地记载了现代主义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热衷)。与之对应的俄罗斯观念是,当代既是对俄罗斯“黄金时代”——现代俄罗斯文化开端的普希金时期——的继续

① 参见帕佩诺:《艺术的意义:象征主义理论》;奥尔加·马蒂契(Olga Matich):《爱的象征意义:理论与实践》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第三罗马与俄罗斯乌托邦传统》,这些论文展示了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和传记实践对 19 世纪 60 年代传统的修正;伊雷妮·马辛-得利奇在其《创造活生生的艺术品:象征主义的皮格马利翁及其先驱》论证了皮格马利翁这一象征性形象的延续性。

(这种继续是经过现实主义时代的某种“中断”之后的继续),又是对它的重复^①。

现代主义者在对俄国 19 世纪中叶的文化及其实证主义、市民倾向、对现实主义的坚持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发现另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中介。这位具有争议的人物既是一位“皈依”了东正教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又是一个与如同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市民现实主义者进行争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他身上,那些 20 世纪初的作家们在同实证主义的斗争中找到了支撑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吸引他们的地方是他对宗教与神学文化作用的寻求。宗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其 19 世纪末的创作中对陀氏思想进行了再诠释,这有助于 20 世纪初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吸收。正是作为一个关心新时代中人与上帝之关系的思想家(正如西方的尼采)、一个相信“美会拯救世界”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吸引了现代主义者的想象力。

这种同过去相连接的强烈要求,同时还体现在“有意识地创造历史”(用曼德尔什塔姆的习语来说)或文化传统的有意识创造这项总的计划中。生活在一个动荡时代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已经“从历史中被驱逐出去”,这许多人共有的感受激发了曼德尔什塔姆的

① 本译文集中多篇文章都详细讨论了普希金形象对现代主义者的作用:参见鲍利斯·盖斯帕诺夫《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化神话中的黄金时代及其作用》;伊琳娜·帕佩诺《普希金与白银时代人们的生活》;若昂·格罗斯曼《我的普希金:勃留索夫寻找真正的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丽莎·克纳普《茨维塔耶娃和两个娜达丽亚·冈察洛娃:双重生活》;J. 马尔姆斯塔德《黄金中的银线:安德列·别雷的普希金》;维廉·托德《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普希金三联画》;而伊琳娜·帕佩诺在《20 世纪俄罗斯文化(1899~1937)中的尼采主义和普希金回归》中指出了把白银时代作为黄金/普希金时代回归的思想同尼采“永恒轮回”思想之间的关系。

计划,即再造和复兴过去的历史^①。曼德尔什塔姆的计划同时体现在他的理论文章和诗歌作品结构中,这些诗歌直接和间接地涉及世界文学中的其他作品。这一诗歌原则——当代文学研究中人所共知的“互文”——得到与尼古拉·古米廖夫、曼德尔什塔姆和阿克赫马托娃等名字紧密相连的整个阿克梅诗派的采纳。被文学和其他文化关系所渗透的诗歌,似乎代表了记忆的活生生肌质,包含了“世界文化”^②。

联接过去的冲动和总体性原则也表现在文本和作家传记之间的关系中,或者用传统审美术语来说,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中。过去被浪漫主义者所提出、现实主义者又以新的方法提出的这个问题,对象征主义创造者来说是关键性的,而象征主义作为一场运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10年)是俄国现代主义的发端;此外,把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原则在从20世纪之交到30年代的俄国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继浪漫主义之后,象征主义者渴望把对立转化为一个统一体,并把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在“生活”被视为一种艺术创造的对象或一种创造性行为的同时,艺术被宣称为具有能够并注定要“创造生活”的力量。对艺术家来说,“人”与“诗人”、个人生活与艺术(创造性)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俄罗斯象征主义者付诸于实践的融合艺术与生活原则,在俄文中普遍称之为“生命创造”,但这

① 参见本译文集中卡莱尔·卡瓦纳的论文《传统的现代主义创造》和《曼德尔什塔姆、尼采与有意识地创造历史》。

② 曼德尔什塔姆的(更广泛地说,阿克梅派的)这些诗学原则第一次得到系统诠释是在苏联符号学派学者们莱温、谢加尔、基门契科、托勃洛夫和齐维安合著的论文《作为潜在的变化俄罗斯语义诗学》中,该文发表在西方杂志《俄罗斯文学》(№7/8,1974)。近年来在西方和苏联出版了许多研究曼德尔什塔姆和其他诗人诗歌中互文现象的成果。